

斷裂或延續——1950年代中國城市 社會文化史的回顧與反思

潘博成*

在現代中國政治經濟史中，「突破 1949」是北美歷史學界於 1990 年代初，因應中國時局、新出研究材料以及史學取徑而提出的研究主張。儘管海外學界和中國大陸等地史學界之研究動機各異，但並不妨礙他們在 2000 年前後幾乎同時轉向「1950 年代中國」，並且逐步細化「1950 年代中國」在時間和空間方面的多面性研究，而「斷裂或延續」是最主要的研究視角。在這些討論中，城市社會文化史又是研究者較為關注的領域，革命史、日常生活、「國家——社會」和城市大眾文化是具體的研究課題。本研究回顧首先評述以上學術史與研究議題，其次指出城市以外的因素，也是詮釋城市文化斷裂或延續的可能研究方向。

關鍵詞：突破 1949、斷裂或延續、1950 年代中國、城市社會文化史

* 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一、前言

在柯文(Paul A. Cohen)提出「突破 1949 障礙」(break through the “1949” barrier)以後，¹如何突破「1949」並且將二十世紀中國視為整體加以研究，成為 1990 年代北美中國研究學界反覆討論的議題之一。2000 年以後，中國大陸學者也加入了這一對話，並聚焦在「1950 年代」的斷裂或延續性。這場討論最初源自政治經濟史，現今已由社會文化史(特別是城市史)繼承衣鉢。城市社會文化史領域對該學術脈絡形成之回顧和對話較少，針對該領域的評述也不多見。本文意圖連結以上兩者，評述如下議題：從「突破 1949」、「斷裂或延續」到「1950 年代中國」之研究脈絡如何形成，中國史學界與北美為主的海外學者對該主題的討論有何異同？當該主題逐步受到城市社會文化史研究重視後，形成了哪些重要的討論主題？我們又該如何反思或拓展研究思路？

二、從「突破 1949」到「斷裂或延續」

就像是 1950 年代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造成北美學界「談中色變」的恐懼感，或是越南戰爭在 1970 年代前後促使北美史學界反思「帝國主義」一樣，「突破 1949」的醞釀同樣源於現實環境變動。1980 年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後所帶來的一系列經濟與社會變革，使既往研究典範出現困境(詳見下文)，「突破 1949」便是當時新的嘗試方向。但在 1988 年柯文撰文提出之前，已有研究者跨越「1949」發展問題意識。

¹ Paul A. Cohen, “The Post-Mao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518-540.

(一)舊研究典範失效的 1980 年代中國

北美中國研究在 1960-1980 年代大致走過全能國家(極權主義)、多元主義，以及「國家——社會」(市民社會)三種典範轉變。²其中，1980 年代以降，隨著中國逐步開放，查閱檔案、田野調查和統計分析等研究方法開始廣泛運用於中國研究。「國家——社會」成為學界所流行的討論框架，也是柯文討論「跨越 1949」的思想資源。³研究者逐步發現，晚清民國以降的國家政權建設，政權結構充斥著斷裂或動盪；若降至社會層面，國家控制社會的意圖雖時斷時續，但總體一貫。這些觀點得益於 1980 年代北美學界對中國農村的深入研究，下一小節將扼要回顧之。

「突破 1949」之所以是對此前研究典範的反思，也與學科疆域固化相關。類似於中共黨史「紅色敘事」的基本觀點，⁴「1949」在北美學界同樣是一個象徵斷裂的時間點。它既來自與自由世界對立的共產主義的冷戰思維，也源於海外學者在中國從事個案研究時，受到當時中國知識界或大眾的「解放前／後」時間觀念的影響。在學科疆域方面，由於 1949 年以後的中國相關研究，隸屬於政治學和社會學等社會科學領域，而 1949 年以前的中國相關研究則通常被歸類為歷史學領域，造成兩段時期在學術訓練模式、問題意識、研究材料乃至於

²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15-40.

³ Paul A. Cohen, "The Post-Mao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523-524.

⁴ 「紅色敘事」認為中共新政權以集權主義方式，成功而有效地控制了社會各個方面。見張濟順，〈新革命史與 1950 年代上海研究的新敘事〉，頁 15。

學術交流均難有互動。⁵但 1990 年代前後，當「毛時代」(1949-1976)成為歷史後，⁶歷史學家要如何面對之？

更重要的是，1980 年代中國大陸政治或經濟變化，加速了北美學界的反思過程。在 1980 年代改革開放政策施行以後，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或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冷戰框架失效，這種混雜狀態與 1949-1953 年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乃至二十世紀初中國存在諸多方面相似，譬如：農民大規模進入城市、私營工廠與國營企業並存，或是資本家與中共黨外人士對當局政策的重要影響。⁷現實環境之變使「1949」的斷裂意義開始受到質疑，也啟發歷史學家重返 1950 年代中國——那個原本是社會學家更多關注的時期，以理解現實的巨變。⁸

(二)「突破 1949」在 1990 年代前後的主要實踐

「突破 1949」不是柯文的理論想像，而源於經驗研究的累積，故回顧「突破 1949」必須溯及更早期的地方社會研究。柯偉林(William Kirby)指出國民政府全國計劃經濟體制、中共新政權以及遷臺後國民政府經濟制度的相似性，認為政權更迭並未造成中國現代國家經濟制度明顯斷裂。⁹由此反駁了「民國時期是缺乏政權繼承者的無主時

⁵ Paul A. Cohen, "The Post-Mao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519.

⁶ 「毛時代」一般專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 1949 至 1976 年，此時段深受毛澤東影響。

⁷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

⁸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15-16.

⁹ William C. 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期(interregnum, without heirs)」之觀點，從而支持了柯文「跨越 1949」的主張。¹⁰不同於柯文指出晚清至 1949 年以後，不同政權對地方社會的滲透、控制與整合意圖具有一貫性，柯偉林從經濟制度史指出國家層面的延續性。

地方社會研究(尤其是農村研究)，與其說是回應或借鑒「突破 1949」主張，不如說是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在田野經驗中發覺到「1949」不具備過往所認為的分割意義，而極權主義等典範亦存在嚴重缺陷。弗里曼(Edward Friedman)、畢克偉(Paul Pickowicz)和賽爾登(Mark Selden)對河北饒陽 1930 至 60 年代長時段考察，發現地方權力結構、親屬關係乃至民族主義情緒均具有文化延續性，未因政權更迭而明顯中斷，從而質疑了極權主義典範的合理性。¹¹蕭鳳霞(Helen Siu)以「傳統的循環」指出地方社會文化在改革開放以後與 1949 年以前的循環性。¹²簡言之，他們基於農村社會的經驗研究，從國家與社會關係的維度指出了政權更迭之間，地方社會在民間風俗與儀式等方面的延續現象。

「國家——社會」也是 1980 年代城市史的流行框架。¹³這些研究集中討論晚清民國，鮮有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故未與「跨越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121-141.

¹⁰ William C. 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121.

¹¹ Edward Friedman,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¹² Helen F. Siu, “Recycling Rituals: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121-37; Helen F. Siu,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¹³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William T. Rowe,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1949」形成充分對話。1988年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是本領域在此時期的重要會議。葉文心(Wen-hsin Yeh)、韓起瀾(Emily Honig)等著名的上海史學者均於此會議發表論文。當中大多數論文在1990年代陸續拓展為專書。透過會議論文以及會議綜述可見，¹⁴晚清民國仍然是主要的研究時段，「1949」仍然被視作一個斷裂點：「在1949年共產黨勝利後，一切均發生了改變。」¹⁵但相關專書出版時，多部著述已指向1950年代或更後時期。例如：韓起瀾認為1949年以後蘇北人的政治地位出現改善，但經濟或大眾文化領域仍舊延續著邊緣弱勢的境況。¹⁶這些專書可視為城市史領域「突破1949」的早期成果。¹⁷但有別於2000年以後的1950年代中國研究，此時期作品中有關1949年以後的討論多是晚清民國時期之「餘論」或「尾聲」。至於2000年以後才出現的專門討論1950年代的著述，本文將在第三節詳細評述。

「反思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是1990年代「突破1949」另一個討論視角。柯文認為「革命」是重要維度，其關鍵不在革命之有無，而是「發生了何種革命(或多次革命)」。¹⁸這明顯受到周錫瑞(Joseph Esherick)有關中國革命問題討論的啟發：「革命性進步」的敘事應轉化為將革命視為「一種形式的統治取代另一種形式統治」。亦即，應該問中華人

¹⁴ 張仲禮等，〈上海史研究的首次國際學術盛會〉，頁338-370。

¹⁵ Frederic E. Wakeman and Wen-Hsin Yeh, eds. *Shanghai Sojourners*, 14.

¹⁶ Emily 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¹⁷ 除了上述介紹的幾部著述外，還可參見：Gail Hershtatter,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等。

¹⁸ Paul A. Cohen, "Reflections on a Watershed Date: the 1949 Divide in Chinese History," 30.

民共和國在哪些方面延續了國民黨統治基礎？革命對日常生活造成的斷裂或延續，與革命本身相比有何區別？新、舊統治結構，在模式、話語論述或人事安排的延續應如何討論？¹⁹周錫瑞將「革命」從二十世紀中國的中心移至某些「重要位置」，以深入討論不同政權間的轉換，柯文則試圖指出革命的多重性(revolutions)，強調 1949 年以後，正如毛澤東的「不斷革命論」，從歷次政治運動到文化大革命，表明「革命」在 1949 年並未終結，故應考慮「革命」對 1949 年以後的影響。²⁰中國大陸思想界近年有人主張應視「1949」為「未完成的事件」，或長時段考察「建國」與「革命」的關係。²¹

總體而言，1988 年柯文提出「突破 1949」具有學術標竿意義，它建基於 1980 年代對中國農村的經驗研究，城市史此時只是「餘論」式的介入相關討論。「國家——社會」和革命史的討論與「突破 1949」關係或疏或密，都將成為 2000 年後「1950 年代熱」的理論或路徑背景，在這個過程中，延續重於斷裂，甚至某種程度的拒斥斷裂，是此一時期的反思主軸。

三、「1950 年代熱」何以形成？

2000 年以後，「突破 1949」獲得以北美為主的海外史學界更廣泛的實踐。他們引導中國史學界展開「斷裂或延續」的討論。更有趣的是，中外學者在 2000 年前後幾乎同時轉入 1950 年代中國史的探

¹⁹ Joseph W.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45-76.

²⁰ Paul A. Cohen, "Reflections on a Watershed Date: the 1949 Divide in Chinese History," 30-31.

²¹ 賀照田等，《人間思想——作為人間事件的 1949》，頁 144-168。

討，²²明顯有別於過去「餘論」式思路。本節首先說明北美和中國史學界有關「1950年代熱」學術脈絡的異同性，之後再評述「1950年代」的概念意涵以及其學術價值。

(一)「1950年代熱」的不同學術脈絡

「斷裂或延續」在二十一世紀初，前後成為北美兩場中國史研討會的主題：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會(Historical Society for 20th Century China)2000年年會主題是「架接 1949——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延續性」(Bridging 1949: Historical Continuity in 20th Century China)，2004年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回望 1949-1953年轉變時期」(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Revisiting the 1949-1953 Transitional Era)研討會。它們顯示了北美學界對斷裂或延續的兩種理解方向：其一，延續性討論整個二十世紀中國，考察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總體變遷過程。他們通常更重視政治結構、經濟制度或統治者特質的比對與互證。這點與日本學者久保亨將整個二十世紀中國分為「帝國的中國」、「國民國家形成的中國」以及「社會主義作為目標的中國」三個討論維度具有相似性。²³其二，將中華人民共和國早期歷史研究回溯至更早的起點。他們反思了以「1949」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起點的學術傳統，以 1950年代為研究中心重新進入中共建政初期的歷史情境，並且選擇城市、日常生活、知

²² 此前並非沒有關於 1950 年代中國城市的研究，例如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 1971)主編的會議論文集之多數篇章均與 1950 年代中國城市相關。但將 1950 年代視為研究專題，卻是 2000 年以後的學術動向。參見 John W. Lewis,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²³ 久保亨，〈1949 年革命の歴史的位置〉，頁 3-6。

識生產或商業家族等微觀面向，展開社會文化史研究。從過往討論較少的視野理解延續性因素及其機制，這種取徑將是本文第三節的討論重點。

中國大陸在同一時期也召開了兩場以 1950 年代為主題的研討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9 年在北京召開的「1949 年的中國」研討會，以及復旦大學歷史系 2004 年主辦的「1950 年代中國」研討會。它們與同期北美研討會的主題與學科背景均十分接近。但細讀會議論文或會議綜述，卻容易發現它們對 1950 年代中國之理解與北美史學界相異殊甚。²⁴中國大陸史學界的「1950 年代」討論更多受到內部因素影響。一方面，此時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五十週年，如何評價中共建政成為重要政治議題；另一方面，在學科歸屬上，以何種研究方法、關注哪些研究對象，以及如何處理中共黨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或當代史等學科關係也受到關注。²⁵這種學術脈絡也體現在會議論文以政治、經濟和外交居多，而少見社會、思想、文化、教育、習俗。²⁶在「1950 年代的中國」與會者中，陳兼和張濟順與北美學界有所對話。陳兼指出西方史學界遠不如中國學者重視「1949」，而傾向觀察長時段變化。張濟順則提出「歷史的延續性問題」，認為過去研究重視整體和高層政治人物或事件的研究，對個體和底層人民的連續性欠缺討論。²⁷這些觀點基本延續到她近期對於 1950 年代上海史研究。²⁸

24 限於筆者能力，暫未尋獲「架接 1949-20 世紀中國的歷史延續性」會議詳細材料。以下北美研討會內容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研討會為主。

25 吳景平等，《1950 年代的中國》，頁 467-469。

26 徐秀麗，〈1949 年的中國〉，頁 289。

27 吳景平等，《1950 年代的中國》，頁 467-469。

28 張濟順這方面的研究，以《遠去的都市——1950 年代的上海》一書最具

簡言之，北美學者力圖在「突破 1949」基礎上重新討論 1950 年代的歷史發展。中國學者儘管在史實釐清方面與北美一致，但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等學科視野及新中國成立五十週年的背景，而偏重從政治、經濟和外交等宏觀層面評價 1950 年代的歷史定位。

此外，1990 年代初期綿延至 2010 年前後，中共黨史學者或各省市地方志辦公室圍繞「城市接管與改造」主題，彙整相關史料出版並加以研究討論，是中國史學界介入 1950 年代的另一條路徑。²⁹這些成果著重展現 1949 年之後「翻天覆地的斷裂」，但細讀相關材料，當中亦包含大量歷史延續性的線索。譬如：《廣州接管史錄》記錄了新廣州公安局、警備司令部和人民法院接管、清點、檢討與培訓國民黨舊職員、散兵或警員等舊人留用之情況。³⁰不過，中共黨史等領域對「接管」與「改造」的專題研究也提供了社會文化結構斷裂性的一面，對於避免過分強調延續性有一定意義。³¹

(二)「1950 年代」的概念複雜化與學術重要性

1950 年代的不同時期，或中國不同地方所經歷的 1950 年代，均有其差異性和複雜性。研究者由不同時期或地方切入，亦會提出各種問題意識或結論。「1950 年代」複雜性可由此窺見，歸納其一般性規

代表性。

²⁹ 以廣州為例簡要說明該領域出版情況。黃穗生、歐陽湘，《廣州接管史錄》；中共廣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廣州社會改造史錄》；中共東山區委黨史研究室、東山區檔案局，《廣州市東山區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

³⁰ 黃穗生等，《廣州接管史錄》，頁 184-190。

³¹ 這系列研究以「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較有系統性，內容涉及廣西、吉林、大連、濟南等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情況，通常包括史料分類彙編、大事記和專題研究等部分。

並不明智，³²更重要的是，研究者如何透過研究 1950 年代中國，逐步探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初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複雜狀況。

為何「1950 年代」具有學術重要性？改革開放與 1950 年代初期中國的相似性，引發研究者興趣。但這是從歷史經驗解釋當下變遷的思路，並未正面回應為何「1950 年代」需要研究。在中國史學界內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研究者對於 1950 年代觸碰甚少，³³正如許紀霖和羅崗的觀察，「1949 年以前和 1992 年以後的上海遙相呼應……這一論述得以完成，端賴於在時間上將新中國成立後的四十多年的上海歷史屏蔽於無形」。³⁴這個時期長期被各類政治運動及其後的文化大革命籠罩，相對溫和的 1950 年代則被裹挾其中而難以被深入討論其歷史脈絡，甚至被視為文革前奏，但 1950 年代是否必然埋下了此後歷史發展的種子？³⁵若不能跳出後見之明的角度，又如何能夠理解 1950 的實際情況？這是 1950 年代會相對「前十七年」（1949-1976）、「前三十年」或「毛時代」等斷代，被單獨討論的原因。

更具體地說，1949-1953 年（「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又是特別受到關注的時期。相對於 1953 年以後各類改造運動，這段時期的社會環境相對平和且政權尚未穩定的特質，這種「蜜月期」的特性成為斷代研究眾多的主要原因。從「國家——社會」角度觀之，國家此時尚不具

³²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7.

³³ 近年來不僅歷史學界注意到了這一情況，電影史、文學史亦對整個「前十七年」（1949-1976）的「斷裂」、「遺忘」或「忽視」提出過類似觀點。參見 Yomi Braester and Tina Mai Chen, "Fil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The Missing Years?" 5-12. 張鴻聲，《城市現代性的另一種表述——中國當代城市文學研究 1949-1976》。

³⁴ 許紀霖等，〈城市空間再生產與社會主義新傳統〉，頁 231。

³⁵ 張濟順，〈新革命史與 1950 年代上海研究的新敘事〉，頁 14-20。

備完全控制社會方方面面的能力。³⁶從個體心態而言，諸如相聲演員等經歷過自我調適的文化精英，認為自身已經適應了中共新政權環境，並且開始想像未來的舒適生活。這些早期積累的自我調適經驗為他們在日後各種改造中的抉擇埋下了伏筆。³⁷簡言之，1949-1953 年間的新民主主義時期中國，不應與此後「反右」運動或文化大革命等時期的中國混為一體，更不能簡單地認為新民主主義時期必然會導致此後種種政治變化的發生。但在社會個體等微觀層面，他們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累積的個體經驗，會如何影響他們在日後的抉擇，則尚需更充分的歷史研究。

但「蜜月期」不會均質地分布於全國，在不同城市也千差萬別。上海目前討論最為豐富，在社會文化史領域，已經廣泛涉足了舞廳、³⁸文化娛樂場所、³⁹博物館與展覽文化，⁴⁰以及廣告文化等。⁴¹但在「走出上海」的呼喊下，⁴²1950 年代中國城市史至少沿著兩方面展現出更複雜的空間性。一方面，東南沿海之外，諸如西藏或東北的大連、長春等城市，在 1950 年代所經歷的斷裂或延續生態便與上海顯著不同。

³⁶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9.

³⁷ Perry Link, "The Crocodile Bird: Xiangsheng in the Early 1950s," 207-231.

³⁸ 馬軍，《舞廳·市政上海百年娛樂生活的一頁》。

³⁹ 蕭文明，〈國家觸角的限度之再考察——以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的文化改造為個案〉，頁 130-152；胡霽榮，《社會主義中國文化政策的轉型——上海工人文化宮與當代中國文化政治》。

⁴⁰ Denise Y. Ho, *Curating Revolution: Politics on Display in Mao's China*.

⁴¹ Karl Gerth, "Compromising with Consumerism in Socialist China: Transnational Flows and Internal Tensions in 'Socialist Advertising'," 203-232.

⁴² Joseph W. Esherick,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12-13.

1950年代尚處於戰時狀態的貴州或西藏，軍事管理遠比社會建設恢復重要，⁴³大連則面臨日本殖民遺產、蘇聯接管與中共收回等多方複雜關係。⁴⁴但目前所見，「廈門——臺灣」和「廣州——香港(澳門)」等處理沿海城市所面臨的外部關係的研究尚不多見，我們將在最後一節再詳細討論。另一方面，城市接管的時序先後，也會影響不同城市的變動。如石家莊早在1947年已由中共接管，其城市改造遠早於其他城市。⁴⁵這些城市接管經驗隨著中共「南下幹部」的調撥進而影響了其他城市。

「突破1949」最初具有比較明顯的政治經濟史色彩，近年來的社會文化史研究使「1950年代」概念更顯立體，並逐步使斷裂或延續視角與革命、日常生活和文化現代化等傳統框架交織。這也是「突破1949」或其「斷裂或延續」真正刺激當代中國史學界的關鍵。

四、1950年代中國城市社會文化史的主要議題

對1960年代北美中國研究者而言，1949年以後的中國城市通常是政治、經濟或外交研究之「背景」。遲至1980年代才陸續出現一些城市政權統治、經濟建設方面的研究，或城市居民生活的調查報告。《當代中國城市生活》、《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之〈共和國城市生活〉均是當中的重要著作。⁴⁶有研究者認為毛時代對城市的期

43 Chen Jian, "The Chinese Communist 'Liberation' of Tibet, 1949-51," 130-159.

44 Christian Hess, "From Colonial Port to Socialist Metropolis: Imperialist Legacies and the Making of 'New Dalian'," 373-390; Christian Hess, "Sino-Soviet City: Dalian between Socialist Worlds, 1945-1955," 9-25.

45 李國芳，《初進大城市——中共在石家莊建政與管理的嘗試(1947-1949)》。

46 Martin K.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artin K. Whyte. "Urban lif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682-742.

許是具備「斯巴達式、生產性、平等主義、穩定、團結一致和經濟安全」，但美好期許與現況存在落差。⁴⁷李侃如討論 1952 年前中共在天津利用傳統社會經濟資源推行革命轉變。⁴⁸可見，無論從政策與實踐之落差，或城市傳統資源之取用，都可能呈現歷史的延續。

相較之下，北美學界以社會文化史為取徑來討論 1950 年代中國城市史，則是 2000 年左右才逐步出現，並且迅速得到中國學者回應與參與。無需贅言，這是歷史學領域社會史、文化史或日常生活史轉向的具體產物。但回到 1950 年代中國城市社會文化史脈絡，其問題意識的產生同「突破 1949」及革命史和「國家——社會」等討論密切相連。革命、日常生活、「國家——社會」、城市大眾文化機制現代化是社會文化史主要的討論面向，「斷裂或延續」或多或少介入當中，其能否成為典範仍待商榷，卻不失為一種思考 1950 年代中國城市社會文化史的思路。

(一)革命與城市社會文化

王奇生以「高山滾石」形容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指出既不能「去革命化」，也不能「神化革命」，應回到其歷史脈絡考察這種「非常規政治」，⁴⁹這延續了周錫瑞和柯文關於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討論。這一輪「喚回革命史」不是中共革命史觀的紅色敘事，或是西方對中共革命黑色敘事的重複。⁵⁰1950 年代城市社會文化史研

47 Martin K. Whyte and William L.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302.

48 Kenneth G. Lieberthal, *Reconstruction and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City: The Case of Tientsin, 1949-1953*.

49 王奇生，〈高山滾石——20 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頁 96-106。

50 張濟順，〈新革命史與 1950 年代上海研究的新敘事〉，頁 18。

究的重要內涵包含三點：首先，1949年不是中國革命的終點，在1950年代乃至其後歲月，革命始終以延續或轉型的方式介入城市社會文化生態。其次，在擺脫革命史負擔而倒向現代性以後，⁵¹兩者是否過度對立？作為一種現代化革命，中共革命與過去辛亥革命等革命具有延續性。那麼，城市作為中國現代性最顯著的場域，在1949年以後的現代化進程，如何與革命交織？最後，在新文化史和微觀史浪潮後，面對日益「碎片化」的城市社會文化史研究，如何避免遁入「無意義之境」？革命史或許可能是解決城市史，乃至於更廣義的現代中國文化史困境的出路之一。⁵²概而言之，研究者的總體思路在於探尋革命作為一種能動機制(幹部等基層革命者、革命傳統內部的現代化意識)，如何能夠干預1950年代中國城市社會文化？

中國共產黨內部具有複雜的社會構造，⁵³傳統革命史或政治史多關注中央人物的思想或行為，而忽視領導者之外的革命分子。代表中共接管與改造城市的革命幹部，既是「革命意象」進入城市社會文化的具體代表，其革命觀點混雜著文化慣習也影響城市的社會文化。農村出身是當時接管城市的「南下幹部」的重要身分特徵，加上中共革命觀對城市文化的負面情感，使南下幹部與城市文化之間容易產生張力，尤其反映在飲茶品茗等小資產階級文化意象的衝突。⁵⁴游擊隊等地方革命運動出身的城市幹部，因其與地方社會存在血緣親屬或經濟利益等複雜關係，對各類政治運動的參與積極性比不上南下幹部，甚

⁵¹ Yeh Wen-hsin,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

⁵² 董瑀，《走出區域研究——西方中國史論集粹》，頁20。

⁵³ Joseph W. Esherick,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45-76.

⁵⁴ 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217-225.

至還與南下幹部存在矛盾。⁵⁵

革命影響城市社會文化的另一種機制，來自中共革命觀念與其他政治或社會傳統的交織。「農村包圍城市」是中共革命的重要基礎，在論述上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相背離。但在城市管理實踐中，革命論述與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關係並非如此二元對立。中行別墅是 1920 年代以後，上海中國銀行為其職員建設的住宅群，並提供了禮堂、綠地等公共服務設施。葉文心指出 1949 年前後上海中行別墅中的職工生活並未發生明顯變化，集體生活、階層秩序以及時間管理明顯延續。⁵⁶這是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中家長秩序以及資本主義現代企業管理方式共構的企業生活文化，與中共政權在現代化方面具有相通性。革命的顛覆性論述不同於將現實中舊秩序的全盤打破，也並非是新政權的無意而為，反倒是因為某些共有理念而使之得以維持。

最後，革命影響城市社會文化的機制也與不同城市的特質相關。不同於在杭州，飲茶等小資產階級文化活動與中共革命觀念發生的衝突，北京作為中共建政之後的首都，革命因素對城市文化的影響機制就大為不同，尤其呈現在政治空間興建與城市傳統空間格局的關係變化。天安門廣場不僅是北京革命文化地標，也可視為全中國的革命文化符號。天安門是舊日紫禁城的入口，但天安門城樓後來成為中共領導人檢閱國慶遊行的政治空間。一方面，新政權延續了舊政權的地理象徵，維持天安門在北京城市空間中的中心區位，同時調取五四運動等革命運動的象徵意義；另一方面，由天安門廣場眺望城樓，代表著封建制度的紫禁城已然成為「背景」。天安門作為新舊兩個時代的分

⁵⁵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⁵⁶ Yeh Wen-hsin,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

界，成為「最具體生動的階級教育大課堂」。⁵⁷北京的首都特質使革命鐫刻在城市空間，而這些新革命空間又成為 1949 年以後持續性革命的活動場址。

(二)日常生活中的「國家——社會」

「國家——社會」是 1990 年代前後晚清民國史主要議題，譬如：哈伯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領域」是否適用於中國？中國有無市民社會？國家與社會關係如何變動等均有豐富辯論。1950 年代中國城市史研究亦傾向以「國家——社會」作為分析工具，並包含兩個明顯偏向：其一，國家政權的斷裂對社會有何影響？其二，從「日常生活」取徑討論「社會」，考察其在 1950 年代之斷裂或延續。

盧漢超對「霓虹燈外」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細膩研究，是啟發中國城市社會文化史研究者重視日常生活領域的重要著述。⁵⁸盧著雖未直接觸碰斷裂或延續性議題，但已潛含一種假說：現代性上海與未被現代性影響的上海的分離。這是否過度削弱了現代性在上海的影響，而懷舊地製造了另一劍走偏鋒的分析框架？近期關於 1950 年代中國城市社會文化史研究警惕於這一陷阱，轉入不同程度「平衡論述」以全面勾勒城市景觀。

其中，國家在日常生活不同面向的涉入程度是第一種思路。董倩「反向閱讀」《新民晚報》指出上海市民日常生活在「前十七年」經歷「緊——鬆——緊」的總體強度變化，但不同領域又有所差異。例

⁵⁷ 洪長泰，《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頁 45。

⁵⁸ Hanchao Lu,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Hanchao Lu, "Out of the Ordinary: Implications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Daily Life in China," 21-51.

如國家對飲食方面的改造就相當微弱，一方面是飲食作為日常生活基礎的重複性實踐，有其頑強延續性；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的新政權話語，使飲食消費具備一定的正當性，從而使飲食習慣與過往生活習慣保持密切延續。⁵⁹報章雖然細膩展現了1950年代上海生活景觀，但不易窺見背後的運轉機制。對此，研究者或可考慮引入「日常性」(everydayness)概念作為工具，以此更深入地討論日常生活(daily life)背後的運轉方式，而避免止步於描述日常生活之現象。⁶⁰日常生活是「細節的歷史」，就如同前述利用《新民晚報》細讀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場景。日常性的重點則不在還原這些龐雜的生活細節，而是從日常活動的分析中，發現現代化進入市民生活的曲折複雜過程。很顯然，1950年代上海飲食文化是各種「過去」與「現在」混雜在當前時刻(the present)的狀況。在日常性意義上，由《新民晚報》還原出的上海市民日常生活情景，還可更進一步探討，日常生活的變與不變，如何解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運作機制，這是深入詮釋斷裂或延續的著力點。

「社會」在1949年以後應如何界定？這個問題意識延續了裴宜理對「國家——社會」的批判反思：「社會」內部和「國家」內部的細微變異性應得到更深入解釋。⁶¹在1949年以後，「高度社會主義」(high socialism)的「基層社會」(grassroots society)成為社會的重要特徵，⁶²單位和

⁵⁹ 董倩，《改造日常——〈新民晚報〉與社會主義上海生活空間(1949-1966)》，頁222。

⁶⁰ 董玥，《走出區域研究——西方中國近代史論集粹》，頁20；Madeleine Y. Dong, *Everyday Modernity in China*.5.

⁶¹ Elizabeth J. Perry,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704-713.

⁶²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 Johnson,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2.

戶籍又是城市社會最主要的制度因素。⁶³因而，部分研究者繼續秉承制度史思路，討論單位、戶籍、城市居民委員會等制度與 1949 年以前的繼承和轉型關係。⁶⁴

我們主要評述的是另一種思路：日常生活中的「國家——社會」關係。這種貼近社會史或個人生活史的研究方向，如何討論基層幹部與基層社會的斷裂、延續及其波動性？首先，基層幹部自身的複雜性，以及在不確定環境下的自我抉擇，影響了基層政權的實踐。在 1950 年代末期的大躍進中，基層文化宣傳幹部利用其掌握的設備、技術等資源，私下從事諸如盜版印刷等其他文化生產以獲取經濟效益便是一例。⁶⁵其次，基層社會內部的複雜性，應當是造成基層統治困難之原因。但在 1950 年代初期的城市基層管理的實際運作中，面對著同樣複雜的基層社會結構時，為何居民委員會比過去的保甲制度更為有效？張濟順認為，雖然 1950 年代初期居民委員會構成人員的成分複雜，並不符合新政權的革命立場，但「不純潔」的居民委員會是不同社會利益交織的場域，在勞動就業等共同利益上達成了暫時的平衡，使國家得以初步統合社會。⁶⁶對比制度史考察，基層社會內部研究展現出國家控制的實際情況——既可能與基層幹部有關，也可能是基層社會內部協商的暫時性妥協。基層社會內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不同於既往官方史學所論述的「翻天覆地」變化，也有別於西方學界「全能國家」或「極權國家」評斷，而呈現為複雜的波動。這正是以斷裂或延續視角考察基層社會之結果。

⁶³ Tony Saich,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st-1949," 1-57.

⁶⁴ 陳耀煌，〈國家與群眾——北京市城區基層街道體制的建設，1949-1962〉，1-53。

⁶⁵ Matthew D. Johnson, "Beneath the Propaganda State: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Cultural Landscapes in Shanghai, 1949-1965," 199-229.

⁶⁶ 張濟順，《遠去的都市》，頁 59-63。

(三)城市大眾文化的現代化與市民反應

晚清民國城市文化史研究中，戲院、茶館、妓院等文化空間的現代化改造已有眾多討論。歷史學界對 1950 年代對上述這些文化現象轉型的研究可視作其延伸，受眾反應又經常成為學界思考斷裂或延續的重要分支。

城市文化機構的接管與改造是大眾文化現代化的重要環節。以戲劇改造為例，「改戲、改人、改制」(即「三改」)為中心的戲劇改革運動，是 1950 年代城市文化生態中的重要事件。在官方的標準論述中，「三改」被視為使戲劇內容適應與配合新政權政治意識形態，從舊制度中拯救戲劇演員的歷史過程。但這種「解放」式論述忽略了國民政府時期對文化體制的現代化改造。以越劇為例，中共政權不斷將越劇納入市場管理體制，編劇專業化以及將戲劇作為國民建設一部分等做法，與國民政府時期對城市戲劇行業的改造，或是晚清民初推行「文明戲」、改造戲園觀眾等作法均有不同程度相似性。以評彈為例，在國民黨新生活運動時期，已經成為政權運用的宣傳工具，而至共產黨政權時期，仍然在《白毛女》等彈詞開篇採取了相同策略。⁶⁷換言之，晚清民初至「前十七年」時期，可視為國家如何不斷地將城市文化轉向現代化的過程。⁶⁸但在持續的文化改造過程中，共產黨政權的改造效果明顯比國民黨更為有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共產黨政權通過居民委員會等城市基層組織建設，實現了對城市基層社會更為有效的統合；另一方面則是，國民黨政權往往只改造文化生產者，但共產黨的

⁶⁷ 何其亮，《個體和集體之間——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評彈事業》，頁 50。

⁶⁸ 姜進，《詩與政治——20 世紀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劇》，頁 356。

城市文化改造則涉及從文化生產到文化消費的全部環節。⁶⁹這種現代化觀點的弊病在於，它只是關注到被國家業已納入文化體制管理的文化藝術，卻忽視了諸如成都打擊圍鼓等未能進入體制的文藝或藝人，而國家管理對文化藝術活力的嚴重制約，亦未被充分考慮。⁷⁰

研究者近年來也逐漸注意到了文化生產者自身所具有的慣習(habitus)或頑固性，使城市文化改造變得不易。過去的主流研究偏重由文化現代化，或國家對文化改造的強大能力等方面分析，而一定程度忽略了文化生產者的不易改造的特性。首先，文化現代化不意味著文化生產者徹底改變，某些「舊人舊習」並未因為改造而消失。在 1950 年代初期，上海文化站或文化館受制於財政經費有限，不得不同時扮演管理者與創利者的角色。此種情況下，國家主導的文化現代化意圖，在地方被部分消解，使文化改造無法徹底完成。其次，傳統表演藝人的文化慣習，以及傳統社會關係也制約了改造效果，⁷¹這與以下將討論的觀眾文化消費慣習的延續是一體兩面的問題。儘管舊文藝內的社會關係改造是「三改」重要主題，但實際，藝人既存的社會關係網絡以及利益關係，仍然強烈地影響著文化藝術團體內部的組織。最後，文化生產者在 1950 年代初期的生存境況，具有強烈的不確定性。這種特殊境遇使文化生產者無論在文化內容製作或展演等方面，均存在某些嘗試性心態。⁷²這也正是文化現代化過程中所出現斷裂與延續並存的內部因素。

戲院等城市文化空間的消費主體是城市居民。民國初年，精英知識分子主導了戲園中觀眾社會秩序的重建，試圖使觀戲者被「文明

69 馬軍，《舞廳·市政上海百年娛樂生活的一頁》，頁 245-246。

70 王笛，《國家控制與社會主義娛樂的形成》，頁 76-105。

71 蕭文明，《國家觸角的限度之再考察》，頁 130-152。

72 Perry Link, "The Crocodile Bird: Xiangsheng in the Early 1950s," 207-231.

化」。⁷³1949 年以後這種改造過程依舊存在，文化消費者的「文化相對自主性」，⁷⁴與前述文化現代化的種種困境結合，使市民文化消費偏好在 1950 年代具有明顯延續。1950 年代初期的抗美援朝以後，上海電影院的美國好萊塢電影被逐步清退，改由蘇聯為主的社會主義國家電影取而代之。但對上海市民而言，填補好萊塢電影空白的卻是香港電影，這些電影成為懷念舊上海城市文化(西方文化)的特殊中介。⁷⁵「摩登上海」看似轉變成為紅色上海，但由文化消費慣習，如觀看電影的選擇偏好等方面，可見上海市民對好萊塢等西方文化的想象並未消失。

最後，1950 年代中國城市大眾文化的現代化改造，除了改造舊文化以外，也包含創造新文化的一面。一方面，這是新式文化引入的過程。例如，「扭秧歌」成為中共通俗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原生於農村的秧歌文化，在延安時期發展為「鬥爭秧歌」。1949 年之後，秧歌被奉為中共正統文藝活動，被納入城市文化系統，但卻被城市居民視為「鄉下舞」而不受青睞。正如林培瑞以「鱷魚鳥」比喻相聲藝人的自我改造，⁷⁶1950 年代初期的城市秧歌隊依照自己的想像，加入諸如麥克阿瑟等敵對人物形象，而招致政府批評。⁷⁷另一方面，這也是新舊文化「同位替換」的過程，如取締舞廳而推廣交際舞便是明顯例子。但交際舞由於過去舞廳交誼舞遺留下的文化消費習慣，在文化改造以後又重新出現了「墮落」的現象。⁷⁸

73 Joshua Goldstein, "From Teahouse to Playhouse: Theaters as Social Text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na," 753-779.

74 蕭文明，〈國家觸角的限度之再考察〉，頁 130-152。

75 張濟順，〈遠去的都市〉，頁 282。

76 Perry Link, "The Crocodile Bird: Xiangsheng in the Early 1950s," 207-231.

77 洪長泰，〈生與死的節日——中共的通俗政治文化〉，頁 261-302。

78 馬軍，〈舞廳：市政上海百年娛樂生活的一頁〉，頁 243-244。

五、反思與展望

「斷裂或延續」作為 1950 年代中國城市社會文化史常見思路，源於政治經濟史對「突破 1949」的自反。正如畢克偉等指出的，不同區域、社會群體乃至特定家族(個人)在 1950 年代初期的經歷迥異，使斷裂或延續可能不存在單一的歷史規律或變化模式。⁷⁹但是，基於上述城市社會文化史討論，我們仍可指出其最主要的研究思路。

第一，革命作為整個二十世紀中國之一個「過程」，延續至 1949 年以後。城市社會文化如何因延續的革命而變動，革命無法中斷的又是什麼？第二，作為一種現代化革命，中共革命傳統並未阻斷，甚至還強而有力維繫著晚清民國以降的現代化進程。城市大眾文化改造，或國家政權對城市社會的制度化管理，均與民國甚至晚清保持長時段的延續關係。第三，在國家與社會關係中，國家政權未能「全能」地影響社會所有方面。基於「國家——社會」框架，社會的實際斷裂或延續的景觀，是眾多研究努力論證的方向。第四，社會的延續，除了國家能力有限性以外，也與國家選擇重點改造領域有關。日常生活飲食等非政治領域因為極少受到國家矚目而自然延續。第五，社會之延續除了國家政權的有效統治外，也與城市居民自身文化想像、消費風格或生活方式的慣習緊密相關。

(一)再思「斷裂或延續性」的學術價值

近年來，曾有論者對「突破 1949」或其「斷裂或延續」的學術價

⁷⁹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

值提出疑慮，斷裂性是否被過度誇大的延續性所扭曲，而走向另一偏鋒？「斷裂或延續」討論對當代中國研究的重要性究竟是什麼？⁸⁰

關於延續或斷裂之關係，如前文所述，其重點不在於二者中應取何者。事實上，斷裂或延續情況同時纏繞在 1950 年代中國城市內部，更重要的是釐清斷裂或延續之發生機制。譬如，有學者以軟類比(*soft analogies*)和硬關係(*hard linkages*)兩種邏輯進行比較。⁸¹「軟類比」偏重談論 1949 年前後兩段政權中，社會文化現象的相似性；「硬關係」則更進一步指出，相似性內部的歷史演變過程，亦即中共政權是如何繼承並且延續過去政權的統治經驗或方法。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應當更為重視對斷裂或延續現象之發生機制。

但是，「斷裂或延續」的討論對當代中國研究的重要性究竟是什麼？這一設問，一定程度上潛含著典範假設：較之於過往評述頗多的「衝擊——反應」、「帝國主義」或「中國中心論」等典範，「斷裂或延續」是否具有同樣價值？若細讀論文集《勝利的困境》(*Dilemmas of Victory*)的各篇論文，⁸²諸位作者間對話不算緊密，最顯著的共識大致是應當重視延續性，藉此反思斷裂性。但究竟延續性之內部有何差異，則尚未有進一步的討論。不同的城市社會文化所經歷的斷裂或延續之主要動因和機制，可否展開對比研究？新政權給予北京、上海或長春不同定位，其各自的內部變化亦不相同。不同城市之間，是如何

80 Nicholas Simo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453-454; Cesar Vera, Jeffrey Bach, and David Kenley, "Bridging 1949: Brethren Missionaries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153-165.

81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等，〈再思 1949 年分水嶺——政治學與歷史學的對話〉，頁 11。

82 Jeremy Brown and Paul Pickowicz,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相互想像，作為正面意義的模範，還是負面教材加以警思？這些問題，都需要再深入持續探究。

可以確定無疑的是，「斷裂或延續」作為一種研究思路，已經在城市社會文化史中表現出重要價值。「斷裂或延續」視角的不斷挪移，有助釐清 1950 年代城市社會文化在高度不確定性的環境下，不同社會群體如何基於自身各異的經驗，以及對時局變化之猜想評估，而最終作出了何種實踐。相對於不同城市之間的對比討論，深入城市社會文化內部，微觀地探尋其中的運作機制或更具學術重要性。因此，筆者傾向於同意董玥和張濟順等學人的倡議，應該重返諸如革命史、日常生活史等研究框架，透過斷裂或延續之鏡頭，將所見的城市社會文化微觀場景，置入不同研究框架以探尋歷史變化的動因。

(二)域內外的斷裂或延續性

儘管 1949 年以後的中國，採取了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策略。但至少在 1950 年代之初，城市社會的真實圖景中，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陣營並未完全退場。更何況，「一邊倒」的國家外交主張，未必取得所有國民之認同。以大連為例，蘇聯在當地居民認知中並非是某種光輝高大的形象，反而由於 1945 年以後種種不良作為而成為當地幹部和居民心目中負面的「大鼻子」形象，從而使得如何切斷這些舊印象，在「中蘇友好」脈絡下塑造新城市文化變得極為棘手。⁸³再如宋怡明(Michael Szonyi)基於冷戰結構討論金門社會文化史亦極富啟發。他指出，「前線」與「邊緣」的特殊境況，使雙方都

⁸³ Christian Hess, "From Colonial Port to Socialist Metropolis: Imperialist Legacies and the Making of 'New Dalian'," 373-390.

需要利用或想像對方以推進統治，卻又要時刻提防對方的可能威脅。⁸⁴這項研究啟發我們，可以從沿海地區城市與其具有實質性連結的域外區域的關係再進一步討論。比如：廈門與金門、廣州與港澳均是重要例子，它們是進行城市之間比較研究之外的另一種思路。

正如上海居民在 1950 年代後期，以香港電影取代好萊塢電影退場後的文化空缺，⁸⁵亦如李歐梵對上海與香港反復互為他者的精彩討論。⁸⁶香港無疑是 1950 年代中國城市的一個重要參照點。那麼，廣州——這個從北方中國觀之被視為南方的邊緣城市，以港澳觀之則屬於距離最近的內地城市——在 1950 年代，與港澳保持著何種關係？若說上海和香港，更多表現為文化想像中的互為他者，廣州和香港則是一衣帶水的直接連結，在晚清民國史中曾長期作為彼此的「緩衝區」，在一方處於戰亂或文化認同危機時，另一方則是其逃離之地。⁸⁷我們不禁好奇，1949 年以後，兩地之間的社會文化關係如何轉變，其內在斷裂或延續的邏輯是什麼？我們至少可以透過已知史料略舉一例：廣州市民中，具有在港澳親戚者不在少數。在廣州居民的日常生活中，港澳是一部分人的緩衝區；時局不濟時，則是居民以正常或冒險方式前往的落腳點，或是依靠港澳親友接濟以度時艱。更寬泛地說，它在大眾觀感中，形構了一種可能挪移於兩地的斷裂和延續狀態。這促使中共政權需要對此不斷做出反應以穩定社會文化秩序，諸如：教育工

⁸⁴ Michael Szonyi,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⁸⁵ 張濟順，《遠去的都市》，頁 282-283；Matthew D. Johnson, "Beneath the Propaganda State," 199-229.

⁸⁶ 李歐梵，《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

⁸⁷ 程美寶，〈從「省港澳」到「粵港澳」——歷史失憶與現實定位〉，頁 264-279；程美寶，〈省港聲色味——從 20 世紀 20 年代兩地畫報所見〉，頁 28-51。

人正確看待他人的親戚從香港寄回東西，⁸⁸或籌備港澳生活展覽等。⁸⁹這種社會與文化生態，是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廣州城市斷裂或延續的一個重要因素。

斷裂或延續議題的形成，是現實環境的變化與學術界內研究趨勢轉變共同造成的結果。這一研究趨勢目前又集中在關於 1950 年代中國的討論，這正是 1949 年前後兩段政權時期「縱橫交錯」最為繁密的一段時間。透過對城市社會文化研究的評述，斷裂或延續的視野豐富了我們關於該時期城市歷史的認知。隨著該領域的研究增多，尤其是朝向不同區域和層級城市的研究蓬勃的發展，或許在未來，我們將能夠更好、更全面地認知這一時期的中國城市，甚至為「國家——社會」、革命史等經典主題帶來新的見解。

(本文於 2017 年 11 月 24 日收稿，2018 年 5 月 13 日通過刊登。

本期原訂 2018 年 3 月出刊，因故延至 2018 年 7 月出刊。)

88 〈華南金幣廠進行「香港還是廣州好」教育的做法〉，1962 年 8 月 6 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 214-1-203-017~023。

89 〈「港澳生活展覽」陳列大綱(初稿)〉，1963 年，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 214-1-300-046~049。

徵引書目

- 久保亨，〈1949年革命の歴史的位置〉，收於久保亨，《1949年前後の中国》，東京：汲古書院，2006，頁3-6。
- 中共東山區黨史研究室，東山區檔案局，《廣州市東山區城市的接管與社會改造》，廣州：東山區檔案局，1999。
- 中共廣州市黨史研究室，《廣州社會改造史錄》，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11。
- 王奇生，〈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52：5(上海，2013)，頁96-106。
- 王笛，〈國家控制與社會主義娛樂的形成〉，收於華東師範大學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中國當代史研究》，第1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頁76-105。
- 何其亮，《個體和集體之間——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評彈事業》，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 余敏玲編，《兩岸分治——學術建制、圖像宣傳與族群政治(1945-2000)》，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 吳景平、徐思彥主編，《1950年代的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
- 李國芳，《初進大城市——中共在石家莊建政與管理的嘗試(1947-1949)》，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 李歐梵，毛尖譯，《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 姜進，《詩與政治——20世紀上海公共文化中的女子越劇》，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 洪長泰，〈生與死的節日——中共的通俗政治文化〉，收於洪長泰，《新文化史與中國政治》，臺北：一方出版社，2003，頁261-302。
- 洪長泰，《地標——北京的空間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
- 胡霽榮，《社會主義中國文化政策的轉型——上海工人文化宮與當代中國文化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徐秀麗，〈1949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2(北京，2000)，頁266-289。
- 馬軍，《舞廳·市政上海百年娛樂生活的一頁》，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0。
- 張仲禮、朱慶祚、熊月之、潘君祥，〈上海史研究的首次國際學術盛會〉，收於上海市

- 地方志辦公室編，《上海研究論叢》，第4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9，頁338-370。
- 張濟順，〈新革命史與1950年代上海研究的新敘事〉，《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上海，2015)，頁14-20。
- 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 張鴻聲，《城市現代性的另一種表述——中國當代城市文學研究1949-1976》，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 許紀霖、羅崗，〈城市空間再生產與社會主義新傳統〉，載於許紀霖、羅崗，《城市的記憶：上海文化的多元歷史傳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1，頁230-281。
- 陳耀煌，〈國家與群眾——北京市城區基層街道體制的建設，1949-1962〉，《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88(臺北，2015)，頁1-53。
- 程美寶，〈省港聲色味——從20世紀20年代兩地畫報所見〉，收於陳平原編，《香港：都市想像與文化記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28-51。
- 程美寶，〈從「省港澳」到「粵港澳」——歷史失憶與現實定位〉，《人間思想》，第1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頁264-279。
- 賀照田、高士明主編，《人間思想——作為人間事件的1949》，第1輯，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
- 黃穗生、歐陽湘，《廣州接管史錄》，廣州：廣東經濟出版社，2009。
- 董玥，《走出區域研究——西方中國史論集粹》，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 董倩，《改造日常——〈新民晚報〉與社會主義上海生活空間(1949-1966)》，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李里峰等，〈再思1949年分水嶺——政治學與歷史學的對話〉，《學海》，1(南京，2015)，頁5-49。
- 蕭文明，〈國家觸角的限度之再考察——以新中國成立初期上海的文化改造為個案〉，《開放時代》，3(廣州，2013)，頁130-152。
- 謝國興編，《改革與改造——冷戰初期兩岸的糧食、土地與工商業變革》，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
- Braester, Yomi, and Tina Mai Chen. "Fil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79: The missing years?" *Journal of Chinese Cinemas* 5, no. 1 (2011): 5-12.
- Brown, Jeremy, and Paul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Brown, Jeremy, and Matthew D. Johnson eds.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Cohen, Paul A. "The Post-Mao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7, no. 3 (1988): 518-540.
- Cohen, Paul A. "Reflections on a Watershed Date: the 1949 Divide in Chinese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New Approaches*, edited by Jeffrey Wasserstrom, 27-36. London: Routledge, 2003.
- Dong, Madeleine Y, and Joshua L. Goldstein eds. *Everyday Modernity in Chin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 Esherick, Joseph W. "Ten Theses 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a* 21, no. 1 (1995): 45-76.
- Esherick, Joseph W.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 Friedman, Edward, Paul G. Pickowicz, and Mark Selden. *Chinese Village, 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Gao, James Z.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 Gerth, Karl. "Compromising with Consumerism in Socialist China: Transnational Flows and Internal Tensions in 'Socialist Advertising'." *Past & Present* 218, suppl_8 (2013): 203-232.
- Goldman, Andrea. *Opera and the Cit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 1770-1900*.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 Goldstein, Joshua. "From Teahouse to Playhouse: Theaters as Social Texts in Early-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2, no. 3 (2003): 753-779.
- Harding, Harry.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edited by David Shambaugh, 15-40. New York: M. E. Sharpe, 1993.
- Hershatter, Gail. *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Hess, Christian. "From Colonial Port to Socialist Metropolis: Imperialist Legacies and the Making of 'New Dalian'." *Urban History* 38, no. 3 (2011): 373-390.
- Hess, Christian. "Sino-Soviet City: Dalian between Socialist Worlds, 1945-1955." *Journal of*

- Urban History* 44, no. 1 (2017): 9-25.
- Ho, Denise Y. *Curating Revolution: Politics on Display in Mao's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Honig, Emily.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Jian, C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Liberation" of Tibet, 1949-51."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130-159.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Johnson, Matthew D. "Beneath the Propaganda State: Official and Unofficial Cultural Landscapes in Shanghai, 1949-1965." In *Maoism at the Grassroots: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Era of High Socialism*, edited by Jeremy Brown and Matthew D. Johnson, 199-229.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Kirby, William C.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1990): 121-141.
- Lewis, John W. *The City in Communist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Lieberthal, Kenneth G. *Reconstruction and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City: The Case of Tientsin, 1949-1953*. Ann Arbor, Mich.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78.
- Link, Perry. "The Crocodile Bird: Xiangsheng in the Early 1950s." In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dited by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207-231.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Lu, Hanchao. *Beyond the Neon Lights: Everyday Shanghai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Lu, Hanchao. "Out of the Ordinary: Implications of Material Culture and Daily Life in China." In *Everyday Modernity in China*, edited by Madeleine Y. Dong, and Joshua L. Goldstein, 21-51.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6.
- Perry, Elizabeth J.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1994): 704-713.
- Perry, Elizabeth J.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Rowe, William T. *Hankow: Commerce and Socie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Rowe, William T.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1796-1895*.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1992.
- Saich, Tony.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ost-1949." *Brill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 Governance and Public Policy in China* 1, no. 1 (2016): 1-57.
- Simon, Nicholas.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acific Affairs* 81, no. 3 (2008): 453-454.
- Siu, Helen. "Recycling Rituals: Politics and Popular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In *Unofficial China: Popular Culture and Though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edited by Perry Link, Richard Madsen, and Paul G. Pickowicz, 121-137.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 Siu, Helen F.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Accomplices in Rural Revol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Smith, S. A. "Rethinking the History of Maoist China." In *A Companion to Chinese History*, edited by Michael Szonyi, 179-190. Hoboken, NJ: Wiley Blackwell, 2016.
- Strand, Davi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Szonyi, Michael. *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中譯本參見宋怡明(Michael Szonyi)·黃煜文、陳湘陽譯,《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6。)
- Vera, Cesar, Jeffrey Bach, and David Kenley. "Bridging 1949: Brethren Missionaries and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0, no. 2 (2013): 153-65.
- Vogel, Ezra F.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Wakeman, Frederic E. and Wen-Hsin Yeh, eds.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92.
- Yeh Wen-hsin. *Shanghai Splendor: Economic Sentiment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1843-194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 Whyte, Martin K. "Urban lif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 1966-1982*, edited by Roderick MacFarquhar; John King Fairbank, 682-74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 Whyte, Martin K. and William L. Parish. *Urban Life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Discontinuity or Continuity: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Cities in 1950s' China

Bo-cheng Pan

Graduat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break through ‘1949’” was raised by the historian of North America in the early 1990s, which was depend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new materials and the researching path in historiography. Although the context and researching intention is different between the historian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other regions, they almost simultaneously present the “1950s’ China” as a vital subject after “break through ‘1949’” in between 2000s. The phenomenon of “discontinuity/continuity” is the key issue in this research field, and greatly influences the urba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in 1950s China, which is particularly intertwined with revolutionary history, everyday life, “state-society” and popular culture in urban space. After reviewing the researching history and major topic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about the elements beyond the cities, which may be a possible researching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Keywords: Break through “1949” barrier, discontinuity/continuity; 1950s’ Chin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cities